

寻找一块碑

■钟兆云

记忆

1954年5月,杨成武同志从广州回京途中,特地绕道江西赣州新城。他要找一块碑。

20多年前,他和战友们亲手在这里竖起一块石碑。这次,他和随行人员在章水两岸找了两个多钟头,也没能找到。在他的记忆里,章水两侧是起伏的低矮丘陵,上面散布着许多坟包,荒凉而寂静。然而眼前的章水两岸,绿树成荫,如一条绿绸在阔大的画卷上悠然铺展;居民住宅星罗棋布,炊烟袅袅。

杨成武脱帽,站在那里,一言不发。他要找的,是张赤男的墓碑。

张赤男是杨成武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,牺牲时只有26岁,时任红4军第11师政委。

—

张赤男年少有志。在福建省立第七中学读书时,他亲手刻过一副竹板联联:“辞旨清真如漱之乐天七言古,行为高至似德公安道一流人。”他以晋代王徽之、唐代白居易的诗书为榜样,以东汉庞德公、东晋戴逵的品格为楷模。

17岁那年,张赤男刻过两个竹雕笔筒,一为李白《关山月》诗句:明月出天山,苍茫云海间;一为唐代诗人祖咏《终南望余雪》诗句:终南阴岭秀,积雪浮云端。可以看出,那时他是个爱好文艺的青年。

后来,他读到《新青年》等进步刊物,渐渐看清了军阀混战与帝国主义压迫的真相。他在学校组织学生联合会,被推举为负责人。1925年“五卅惨案”发生后,他以学生会联合会名义,联络商会、工人、农民,发起游行、发表演讲,使得长汀这座偏远小城,卷入一场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革命风暴。1926年,北伐军进入长汀,张赤男加入了国民革命军。

当时正值国共合作期间,张赤男被选送到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习。1927年2月,张赤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他在写给家乡青年的信中说:“我们是二十世纪的青年,尤其是负有重大使命之革命青年”“我们最重要须解决的就是我们的‘人生观’”。有如此榜样,长汀

的热血男儿哪能不受影响!

大革命失败后,张赤男随叶剑英领导的教导团从九江南下,参加广州起义。起义失败,他随队转战海陆丰。1928年2月,他在惠州阻击战中左腿负伤。3月,他伤愈回到闽西,以母校省立七中教员的身份作掩护,秘密开展革命工作。

这一年,14岁的杨成武正在省立七中读书,住在学校附近的张家祠堂。那时的他,尚不知道这位“张老师”将会影响自己的一生。

夜深之后,祠堂里的油灯忽明忽暗。张赤男给信得过的学生讲“外面的世界”:北伐战争、广州起义,毛泽东、周恩来……这样的启蒙,对十几岁的小城少年影响很大。

那时的汀江岸边,夜里常常出现这样的景象:祠堂灯光昏黄,年轻老师讲的是“打土豪、分田地”;村头茅屋里,农会小组也悄悄成立。革命的火星一处处落下,闽西的夜在不动声色地改变。

1929年1月的一个晚上,张赤男在祠堂里压低声音说:各地已经纷纷起事,闽西不能再旁观。他让这些学生回去跟同学们说——愿意跟着张老师干暴动的,就站出来。

“跟着张老师干!”从这一刻起,杨成武他们不再只是学生。

数月后,张赤男带着杨成武和农会成员,摸进民团,缴了他们的枪。随后,张赤男带领进入深山打游击,武装力量逐渐增至数百人。不久后,毛泽东、朱德在长汀接见了这支队伍,游击队也被编入了红军。

二

1930年6月,红1军团在长汀成立。张赤男任红4军3纵队政治委员,纵队司令员是萧克。他们一手抓军事训练,一手抓思想工作,把队伍建设得作风过硬、纪律严明。几仗下来,他们就打出了名号。后来,部队进行整编,3纵队编为红12师,萧克任师长,张赤男任师政委兼政治部主任。萧克在《朱毛红军侧记》一书中,专门写到张赤男,称赞他“忠于党又有能力”。

1931年11月初,红12师改编为红11师,张赤男仍任政委,师长是他在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时的同学王良。1932年元旦,他们奉命攻克石城红石寨。胜利的喜悦尚未散去,新的战斗任

务已经下达。

1932年1月10日,中革军委发布攻取赣州的命令。2月上旬,张赤男和王良奉命率红11师攻取赣南新城,掩护红3军团攻打赣州。

新城虽小,易守难攻。守敌早已筑起明碉暗堡。2月15日,朝阳刚升起,战斗就打响了。

敌人用几挺机枪封锁了开阔地与两口鱼塘之间唯一的狭窄通道。敌人的工事坚固、火力猛烈,红11师第32团官兵前仆后继,连续几次冲锋,都没能突破敌人的防线。副团长萧君玉也倒在了阵前。

张赤男和王良闻讯赶到团指挥所,与团长、政委躺卧在地,研究如何突破敌火力网。烟雾渐渐消散,敌人注意到团指挥所的位置。于是,密集的子弹如雨点般打来,水花与泥土四溅。

此时,张赤男正指挥部队改变进攻路线。突然,一个战士又爬起来跃进。张赤男眼见他暴露在敌人密集的火力之下,十分危险,猛地站起来,大声疾呼:“卧倒!卧倒!”

战士在他的召唤下卧倒,脱险了。然而,一颗子弹从敌阵飞来,击中张赤男的头部,他重重地倒了下去。王良飞身抱住他,鲜血瞬间浸染全身。张赤男拼尽最后的力气看了他们一眼,断断续续重复两个字——“战斗……战斗……”,便永远闭上了眼睛。

三

张赤男的牺牲令全师指战员悲愤填膺。他们兵分三路:两翼迂回,一部正面猛攻,一举打败了敌人。

战斗结束后,全师列队向张赤男的遗体肃立致哀。警卫排朝天鸣枪,枪声如重锤,震落无数泪珠。

痛失好搭档的王良,在讲话中几度哽咽:“张政委一向是有重大使命的革命青年,有正确的人生观。他的牺牲,不仅是我们师的重大损失,也是红军的重大损失。我们要像他那样,以加倍的勇气夺取胜利……”

随后,张赤男的遗体被就地安葬。那天,章水悲鸣,北风卷着尘沙,绕着坟地呜咽。全师指战员面向土墓鞠躬默哀,久久不愿离去。

沂蒙麦香

■周士豪

小院偏僻冷清,而她脸上的疤痕,更让我心生畏惧,甚至有些抵触。

终于,在一个蝉鸣聒噪的午后,这份抵触爆发成了一场争吵。那天,母亲又让我给她送去刚蒸好的包子。我将碗往桌上一墩,大声嚷道:“她又不是咱家亲戚,凭啥老给她送吃的?她长得那么吓人,我不想去了!”父亲的脸瞬间铁青,抓起门后的竹条便向我走来。奶奶急忙走过来,紧紧拉住父亲的胳膊。随后,她有些激动地对我说:“孩子,你知道你嬷嬷的疤是咋来的吗?”

奶奶缓缓开口,讲起那段往事。1947年,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山东和陕北,沂蒙大地燃起战火。村里的妇女们自发组织起支前队,日夜不停地摊煎饼、备军粮。那时的嬷嬷,20岁出头,思想进步,是支前队里最积极的一个。她没

日没夜地忙,累了也不知歇会儿。她常说:“战士们饿着肚子打仗,咱多摊一张煎饼,他们就多一分力气!”

有天夜里,连轴转的她实在是太累、太困了。但想到天亮支前队就要挑担送粮,磨好的面糊已见底,她又强打起精神,推起刮耙——赶完这批再歇。就在他递出面糊瓢的瞬间,一阵眩晕袭来,她栽倒在滚烫的鏊子上。等乡亲们把她救起,她的半边脸颊、脖颈连同胸部已被严重烫伤,因此落下了疤痕。她原本定好的亲事也作罢了。可她从未抱怨过,只觉得能为支前出力,自己的苦痛算不得什么。

奶奶的话,让我心头如压巨石。想起那方小院,我蓦然懂得:乡亲们的照顾,并非怜悯,而是源自心底的敬重——敬重她为革命胜利忘我的付出。自那以后,再去送饭,我再无半分抵触。我主动

多年后,杨成武依然清晰地记得:他和红4军第11师师长王良、第31团团长刘亚楼、第33团政委刘忠、第32团团长向玉成,“一起流着眼泪,一锹一锹地铲起染着血迹的黄土,掩埋好烈士的遗体,竖起着刻着‘张赤男烈士之墓’的石碑”。

撤出赣州的红4军,不久又经过张赤男的故乡,沿途的映山红竞相开放。抬眼望,满山遍野都是一片红艳,像是烈士的鲜血染红了山冈。

1932年11月10日,张赤男的家乡长汀县宣成区苏维埃政府,为他召开追悼大会,并将宣成区改为赤男区。

朱德对张赤男印象很好,他在回忆红4军人闽时说:“张赤男是个很实在、扎扎实实的好政委。”张赤男牺牲前,朱德曾经到过他的家乡,村里杀猪、做米粿,招待远客。张赤男的母亲问:“我的腾交子(张赤男的乳名)有没有回来?”朱德回答:“你的儿子就站在那面大红旗下,带着战士们正在搭草棚准备住下呢。”然而1932年那个春天之后,若再遇老人问起,他可能除却安慰,还会交出一篇《纪念张赤男同志》——

“我们来纪念赤男同志,就应该加紧创造干部,来继续赤男同志坚决奋斗的精神去领导革命战争,消灭一切白军,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,争取苏维埃运动的完全胜利。”

毛泽东曾和杨成武谈起闽西与古田会议。杨成武回答:会后听张赤男政委传达了会议精神。当听到“张赤男”这个名字时,毛泽东沉默了一会儿,说道:我认识张赤男,这个同志很好,闽西的老百姓也很好……

杨成武一直想要寻找到老师、老首长的墓地。1954年,杨成武回到新城,连找两个多钟头,发现经过多年风雨,此碑无存,旧墓难觅。

新中国成立后,许多烈士的坟墓重修过,也有不少再也寻不着旧址。张赤男的墓始终没有被找到,但在曾经跟随他征战的指战员记忆里,在百姓心里,始终占着一个清晰的位置。

1959年,张赤男烈士纪念碑在他的家乡长汀建成。1981年,萧克将军到长汀视察。为张赤男烈士纪念碑题碑文,他久久沉浸在对战友缅怀中。

或许,真正的墓碑,不仅仅是刻写在木头或石头上的。多年后仍能被活着的人怀念,更是一种深沉的铭刻。

陪她说话,听她讲当年支前的故事。升入中学后,我搬到镇上住宿,回家渐少。可每逢假期回村里,我仍会去她的小院坐坐,陪她晒晒太阳,说说话。

高中毕业那年夏天,我收到了军校的录取通知书。军校第一次放假回家,我特意换上崭新的军装,快步走向那座熟悉的小院。推开栅栏门时,她正弯着腰收拾散落的柴火。转身看见一身军装的我,她眼中掠过一丝惊讶,旋即涌起难以抑制的激动。她颤巍巍地直起身,围着我转了好几圈,粗糙的手掌先是轻轻拽拽我的衣角,又仔细抚过我的袖口,嘴里不停地念叨着:“穿军装就是精神!”

那天,我们聊了很久。我跟她讲军校的训练、生活。她静静听着,接连说好。我将部队配发的棉衣脱下来给她试穿。她接过棉衣,手掌一遍遍抚过布面。她披上那件棉衣,感慨地说:“部队的衣服,厚实又暖和!”

几年后,她因病去世了。葬礼简朴而庄重,街巷里站满了人,细碎的呜咽声悄然传开。得知她去世的消息后,我独自伫立窗前,久久无言。恍惚间,我仿佛看见烽火岁月里,一个与我年纪相仿的沂蒙姑娘,正守着滚烫的鏊子,将一张张飘散麦香的煎饼,仔细放进粗布包袱里。

感念

夏日,阳光明媚,绿意盎然。走进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,我仿佛步入了另一重时空。“侨批”,是馆藏的重要组成部分。“批”,在闽南语和潮汕方言中是“信”的意思。“侨批”则是海外华侨寄给家乡亲属的书信与汇款凭证合称。“客传千里,家书抵万金。”一封封侨批,跨越数千里海上险途,承载的不仅是温暖亲情,更有老一辈海外侨胞浓厚的家国情怀。

1927年,旅居印度尼西亚的华侨陈君瑞,寄回潮汕老家一封侨批,上面写着一个大大的“难”字,并附有一首诗:“迢递客乡去路遥,断肠暮暮复朝朝。风光粹里成虚梦,惆怅何时始得消。”这首诗是当年众多闽粤地区民众漂洋过海讨生活的真实写照。

可正是这些饱经风霜、“难”字当头的海外游子,在民族危亡之际,纷纷站了出来。1938年10月,爱国侨领陈嘉庚联络南洋各地华侨代表在新加坡成立“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”(简称南侨总会)。他带头捐款,精心筹划组织,使南侨总会在短短3年多的时间内便为祖国筹得约合4亿余元“国币”的款项。

在抗战最艰苦的岁月里,一封封写着“抗战必胜”“还我河山”的家书与汇款凭证,从南洋传到祖国东南沿海。海外侨胞和批局也曾向延安及八路军军输送捐款与物资。

与踊跃捐钱献物同样令人感动的,是华侨以血肉之躯走过的抗日救国路。有一条路,叫东兴汇路。

抗战期间,因日军封锁,原有递送侨批的汇路中断。批脚(送批人)们在日军的轰炸和严密搜捕下,开辟出由越南芒街过境到广西东兴,再分流至闽粤各地的秘密通道——“东兴汇路”。据亲历者后代回忆,当时送侨批无异于提着脑袋走路。

东兴汇路被打通后,众多爱国青年也沿着这条路返回国内、投身抗战。有一位叫赵开钊的潮汕侨商,奔走穿梭于边境险地,冒着日军封锁、搜查的重重危险,一次次护送侨批、救国钱款与紧缺物资返乡。日军因此悬赏通缉他全家。万般无奈下,一家人只得搭乘渔船漂泊于海上避难,竟遭遇日军战机扫射,家人坠海。

如今,在广西东兴“侨批路”街口,高大的牌坊上镌刻着这样一副对联:“百年侨批通闽粤连南亚梦断硝烟,三载信汇传飞鸿救家园路在东兴。”这副对联,生动概括了侨批的百年沧桑与东兴汇路在特定历史时期的重要作用。

另一条路,叫滇缅公路。1937年7月,抗日战争全面爆发,中国沿海重要港口多被攻陷,国际运输濒临断绝。1939年1月,新开辟的滇缅公路成为大后方重要的国际通道。当时,国内驾驶人员十分匮乏。1939年2月,陈嘉庚在南洋发布通告,征集华侨司机与技工回国支援滇缅公路运输。通告一出,南洋各地华侨青年踊跃报名。先后有3000余名南侨机工回国支援抗战,在全长1146公里的滇缅公路上驾车抢运物资、抢修运输车辆。

群山路险,瘴疠横行,敌机轰炸。据统计,在滇缅公路上,1000余名南侨机工献出了宝贵生命。他们为抗战胜利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。他们中,有谎报年龄的热血少年,有辞掉高薪的商界人士,有瞒着父母报名的学生,也有女扮男装投身运输的姑娘。

陈嘉庚曾亲赴滇缅公路慰问。他看到机工们衣衫单薄,在寒风中瑟瑟发抖,听他们讲翻车、轰炸、死里逃生的经历,当场落泪。

烽火岁月,青年华侨沈尔七带领华



战鹰飞过麦浪

■何 帅

这是风吹麦浪的时节
白云徜徉在蓝天
原野辽阔
南风送来收获的喜讯,引擎的低语
躬身耕作的人懂得
战鹰翱翔,守护与丰收的希望

这是风吹麦浪的时节
当战鹰写下航迹
麦穗列队,向大地和天空致意
那些被犁铧反复翻润的土地
懂得战鹰的呼啸
也是另一种雷声
饱雨水养分而成熟的麦子

纸短情长赤子心

■李琳

侨义勇队渡海回国,投身抗日。征战中,他数次负伤、染病。然而,每次痊愈后,他都即刻返回前线。让人意外的是,他回国参加抗战,却始终没有回过自己的老家。他给母亲写过一封信,字字泣血:“儿为革命,抗日救国,多年未寄分文到家,致母亲生活更苦,心殊不安。惟今如不抗日救国,民众将永无翻身之日,故儿愿牺牲一切,奋斗到底。”1942年,沈尔七牺牲在战场上。那年,他才28岁。

同样以家书明志的,还有马来西亚华侨姑娘白雪娇。她瞒着父母回国投身抗战。离家那天,她留下一封告别信:“家是我所恋的,双亲弟妹是我所爱的,但是破碎的祖国,更是我所怀念热爱的。”这封薄薄的信笺,承载着比山还重的家国情怀。

华侨的赤诚,并未止步于抗战胜利。新中国成立后不久,鸭绿江畔又起战火。远在海外的华侨华人再次挺身而出。那时,在世界许多城市,华侨沿街义演,群情激昂。有人献出黄金首饰,有人把父母供自己读大学的全部捐了出来。他们传承着老一辈海外侨胞“祖国有难,我辈必担当”的爱国精神。

2013年,凝聚着海外游子血汗与深情的“侨批档案——海外华侨银信”,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列入《世界记忆名录》。研究者在整理这些跨越山海的家书时,无不感慨:“每一封侨批,背后都是一部家国史。”江门籍华侨郑潮炯的故事,正是这部家国史中打动人心的一篇。1940年,在那个抗战艰难的年份,郑潮炯将出生仅40天的幼子送予他人,将所得80元悉数捐出,用于抗日。战火频仍、兵荒马乱的年代,他与家人颠沛流离,多年辗转异国他乡。新中国成立后,经过全国侨联的不懈寻访,这对失散已久的父子才终得团圆。

侨批从来不是单向的汇款通道。它是一条跨山越海的心灵脉络——一头连着海外赤子的心跳,一头系着家乡故土的牵挂。

在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里,那些静静陈列的泛黄信件,依然讲述着催人泪下的故事。从东兴汇路跋山涉水的批脚,到滇缅公路血沃青山的南侨机工;从南洋侨胞写下“抗战必胜”的坚定信念,到侨界青年毁家纾难、支援抗美援朝的赤胆忠心——这个夏天,我读到的不仅是泛黄纸页上的文字,更是海外游子那份矢志不渝的家国情怀与拳拳赤子心。

隔着一纸素笺,见信如晤,爱国情义绵延不绝。

正等待走进谷仓
联合收割机启动
与战鹰的轰鸣
混声为军歌与田园诗的交响

这是风吹麦浪的时节
炊烟升起,朝朝暮暮
每一座村庄、每一块麦田
都在战鹰的羽翼下
战士们懂得,麦浪的金黄
也是勋章和立功喜报上的颜色



第6718期

